

陕西省教委 1996 年重点科研项目

陕 西 人 格 论

——陕西群体人格与经济发展研究

朱志勇 王德春 著
张连举 张伟峰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陕西人格论
——陕西群体人格与经济发展研究

朱志勇 王德春 著
张连举 张伟峰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岐山县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4 插页 232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ISBN 7 - 224 - 04722 - 8/ B · 107

定价: 13.00 元

序

庞德谦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陕西人格论》，是一部系统研究陕西群体人格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学术著作。该书凝结了朱志勇、王德春、张连举、张伟峰四位青年学者两年多的心血，它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区域性群体人格研究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十分普遍。研究课题往往由地方政府部门提出，内容涉及经济发展、市政建设、环境卫生、教育、犯罪和社会文化建设等众多方面。研究人员也大多受雇于政府，研究结果被直接运用到政府的各种决策中。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人格与经济的关系方面。这不仅由于发展经济是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也因为在实施各种发展计划中不充分考虑人格这个变量的作用，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开展人格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对于陕西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曾经是世界文明发源地、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文明的民族和地区，在近、现代几乎全部成为历史的落伍者。陕西也没能摆脱这一厄

运。三秦大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她在历史上曾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过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相媲美的半坡文化、西周文化、秦汉文化、隋唐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一直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伟大贡献。但从近代起,由于各种原因,陕西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这种世界性的现象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提出了种种阐释理论。尽管这些观点彼此相左,但在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文化进化过程是非线型的。美国学者 E. R. 塞维斯在其《文化进化论》一书中对此作了这样的论述:“一种文化在某一阶段的发展处于‘高位’,也许在下一阶段就不会再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了。其原因仅是因为它前一阶段的成功。它的适应形式越是特化,复杂程度越高,那么它就一定越是深深地陷入并受制于自身所造成的现有处境之中。”

文化是人格的主宰因素,人格则是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因此,当文化在某一阶段处于“高位”时,人格相应就会变得高度“特化”,而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随之降低。所以,为了使在某一阶段高度发展的文化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最关键的问题是,该文化的主体必须自觉地及时进行人格的转型。《陕西人格论》一书的作者们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和理论的高度上,以陕西地域文化为中介,围绕陕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陕西群体人格进行了模式、成因、评价和转型的全面研究。该书视角新颖,立意深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模式论部分,作者借鉴文化人类学和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进行了理论创新,提出了一套研究群体人格的理论和方法。运用这一理论,作者从时间、空间、创意、变通、计划、规范和效能七种维度上,对陕西群体人格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从中概括出

“因循守旧”的行为模式、“安息为本”的观念模式、“重土恋家”的情感模式,在总体上完成了对陕西传统群体人格的理性把握。随后,该书转入成因研究。在这一部分,作者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三个方面,对陕西传统群体人格进行了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和民俗的解读。在完成这两项带有“实然”性质的研究之后,该书将视线从远古拉回到现实,并在事实认识的基础上将思维的触角指向对陕西传统群体人格的价值评价。作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和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一致的理论,提出了人格价值评价的理论,并据此对陕西传统群体人格进行了历史文化定位,认定它是自然经济下的依赖型人格,是与“人的依赖关系”相符合、并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最后一部分,该书展开了对陕西群体人格的“应然”研究。作者以现代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省群体人格的现状为基本依据,建构了“开拓创新”的行为模式、“自强不息”的观念模式和“四海为家”的情感模式,以此作为陕西群体人格转型的目标模式。围绕这一模式,作者提出了当前实现人格转型的四项基本任务,并以经济行为作为转型的突破口,为具体实施人格转型提供了对策理论。

朱志勇、王德春、张连举、张伟峰同志合著的《陕西人格论》,结构严谨,语言流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实践上也不乏现实针对性。它的出版对于推动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加快陕西人的现代化步伐,无疑都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在这部专著问世之际,写此言,是为序。

1998年1月3日

目 录

导论:文化·人格·经济发展	(1)
---------------------	-----

第一篇 模式论

导言	(21)
1 行为模式	(24)
1.1 行为:人格的外部显现	(24)
1.2 陕西人行为基本特质	(31)
1.3 因循守旧的行为方式	(55)
2 观念模式	(61)
2.1 观念:人格的内在根据	(61)
2.2 陕西人观念基本特质	(69)
2.3 安息为本的观念构造	(91)
3 情感模式	(97)
3.1 情感:人格的驱力因素	(97)
3.2 陕西人情感基本特质	(101)
3.3 重土恋家的情感世界	(106)

第二篇 溯因论

导言	(111)
4 相对封闭、优越的自然环境	(113)
4.1 封闭的地理环境	(113)
4.2 优越的自然条件	(117)
4.3 陕西群体人格的地缘解读	(121)
5 历史文化重负	(127)
5.1 秦中自古帝王都	(127)
5.2 浑厚的封建文化积淀	(131)
5.3 文明中心漂移后的失落	(137)
6 秦风	(140)
6.1 以农事为本的节日庆典	(140)
6.2 生活习俗面面观	(148)
6.3 秦腔	(156)

第三篇 评价论

导言	(163)
7 陕西群体人格的历史定位	(165)
7.1 基本理论	(166)
7.2 人格定位	(175)
7.3 陕西人与现代人的差异	(180)
8 陕西经济滞后的人格原因	(188)
8.1 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人而不在物	(188)
8.2 陕西群体人格与市场经济的冲突	(197)

第四篇 转型论

导言	(209)
9 陕西群体人格重构的目标模式	(211)
9.1 制定目标模式的基本依据	(211)
9.2 开拓创新的行为模式	(220)
9.3 自强不息的观念模式	(224)
9.4 四海为家的情感模式	(228)
10 人格转型的基本任务	(232)
10.1 更新知识体系	(232)
10.2 提高技能水平	(237)
10.3 转变思想观念	(245)
10.4 改变行为方式	(262)
11 对策	(272)
11.1 工业经济行为的转型	(273)
11.2 农业经济行为的转型	(297)
后记	(327)

导论：文化 · 人格 · 经济发展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意味着实现现代化。它表现为:在经济上,实现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自由商品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变;在政治上,实现从集权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在社会类型上,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由于经济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经济现代化制约其它现代化的发展,第三世界各国普遍将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作为现代化首选的奋斗目标。

在中国范围内,对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概念除具有上述一般含义之外,还具有一些特殊规定性:首先,必须解决一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其次,必须努力缩小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力争获得与东部地区相似的自我发展能力;最后,必须凭借自身经济实力重新确立中西部地区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只有在完成这几项任务之后,中西部地区才能真正合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节拍。

遗憾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不尽人意的,这也包括像中国中西部这样的落后地区在内。这一现象引起包括我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的深切关注,他们就如何促使

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提出了种种理论和对策。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两种理论范型:第一种范型,是将制度、体制、组织机构、运行方式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促发力,认为体制原因是导致经济落后的第一位原因。这一范型的拥护者大多都是政治家、经济学家。他们对体制改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对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持有很高的预期值。我们将这种理论范型称之为“制度范型”。与此相反,另有一些人赞成“观念范型”的解释模式。这一范型的主旨,是将人的因素纳入经济发展中加以考虑,从现代化必须由现代人去实现这一前提出发,将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观念因素看成是经济滞后的最终原因。在这方面,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在《新的发展观》中说:“事实上,进步不是各种机制的运行造成的,它发生于各种活动和相反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于人类行为者彼此冲突的评价中。”他断言,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包括经济范畴的实际含义,都依赖于人的头脑中保留着的文化价值观念。这即是说,同一种经济现象或范畴,如竞争,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理解,因而有不同的实际效应。在一些文化中,竞争被看作是人们在体力和智力上的正当较量,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因而它能激发人的潜能,达到个人和社会都收益的效果。在另外一些文化中,竞争被视为一种利己主义的行为,它有可能导致内耗,使个人和社会都受到损害。因此,一切发展,包括经济发展在内,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发展。

佩鲁将发展同人联系起来,同人的价值观念变革联系起来,并将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自己的目的之一,这与现代化理论的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的发展观》,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 页。

创始人迪尔凯姆和韦伯的观点是一致的。迪尔凯姆认为,从传统社会的狭隘经济关系向现代经济联合的转变,依赖于人们事先改变价值观、态度和规范。韦伯也将人的观念作为解释经济发展的第一位原因。他在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工业只是在西欧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问题时,将最终的原因归结为加尔文教义使那里产生了与这一伦理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精神。现代化理论家 P. 鲍尔 (Bauer) 鲜明地表达了现代化理论对这两种理论范型的态度。他说:“经济能否取得成就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态度,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采取的组织措施,还取决于历史经验;而外部联系、市场机会和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作用则是次要的。”

尽管这两种理论范型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人们还是对体制研究倾注了更多的热情。美国著名学者英克尔斯统计的结果表明,关于体制的研究和关于人的研究之比是 20 : 1。这个比例数字表明,人的问题在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受到了不应有的轻视。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较为复杂,部分是由于研究者怀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对缓慢变化的人格问题不感兴趣;部分是因为人的问题异常复杂,从事一般性研究难以获得普遍认可的结论;也有部分原因与人们对体制和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关。

我们认为,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成因分析上,体制和观念都不可或缺,彼此不能互相替代。体制若无相应的观念配合,若无具有相应观念的人去操作,再好的体制都如同聋子的耳朵,起不到

转引自〔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第 1 版,第 28~29 页。

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观念若无相应的体制配合,若无体现新观念的体制使之对象化,再先进的观念也无法对社会生活发生有效的影响,因而也难以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体制和观念互为中介、互为因果,二者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本课题的确立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陕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缓慢,这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又有观念方面的原因。由于国家改革政策的统一性,尽管陕西的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尚处在不断深化的阶段,还面临着极其繁重的任务,但至少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体制建设还不是制约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陕西人的观念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才是导致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

前陕西省委副书记刘荣惠指出:“陕西是千年古都所在地,因袭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的包袱沉重;又地处内陆腹地,‘四关’之中,地理环境对思想的封闭较大,‘关中’意识较浓,因而,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思想观念影响,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小富即安,怕担风险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左’的思想影响交织在一起,成为阻碍我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主要障碍,成为影响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因此,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先导,进一步清‘左’破旧,力争尽快取得新的突破。”在1997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上,陕西代表在分析我省经济落后的原因时,目光也不约而同地盯住了“思想观念”这四个字。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炳章代表说,制约我省经

《外向型城市·西安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济发展的首要原因是观念陈旧,思想不解放。省旅游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可代表大声疾呼:陕西要发展,必须重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些都说明本课题的基本信念与人们的普遍看法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观念总是属于人的。陕西人头脑中的陈旧观念,作为陕西区域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也是陕西传统群体人格的重要构成要素。这些落后的观念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并通过人们的行为最终影响着经济建设的进程。因此,本课题的基本思路是以陕西地域文化为中介,将陕西群体人格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所以,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必须通过对文化、人格和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的阐述,为这一思路的合理性提供证明。

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科学用语,它是指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原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在现代,经济发展包含着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内容,如社会生产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变化、积累的扩大、需求结构的变化、制度结构的变革、分配制度的改善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和实际生活质量的提高等。人们一般采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工业化率、基尼系数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作为对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经济发展的实现则是自然、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诸多因素和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说的“文化”是狭义的,特指人们的思想观念。其实,思想观念连同政治和经济体制一起可以包含在广义的文化范畴中。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概念,它通常指

韩振军:《走出关中——陕西代表团采访感录》,《陕西日报》1997年3月13日。

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方式,包括一个特定的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内隐的和外显的行为、行为方式、行为的产物及观念和态度。就其实质而言,文化是一整套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外在形式(如建筑物、组织方式等)以及思想深处的规范和价值体系。它们可以通过人们的反思,转化为各种概念、命题,并得到程度不同的论证。但是,这些规范和价值态度在概念化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深藏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内化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是人们记忆与习惯中的传统、日常交往和生活的准则以及自发的倾向性。由此可见,这种意义上的文化通过人的活动,实实在在地对经济发展过程施加着巨大、深刻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曾对农民的落后性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有过生动的实例说明:钦博拉索的印第安人拒绝林业专家的劝说,不去荒山秃岭上种植桉树苗;而在30年里,一英亩的桉树林将使整个村庄“富裕起来”。原因并不是这些印第安人没有意识到桉树的经济价值,也不是因为种植需要专业技术或很大的投入——树苗是免费的,而且印第安人只要将树苗种下去,浇点水,其余的事情,大自然就会完成了,而是因为这些印第安人猜疑整个事件是一个哄骗他们去干活的阴谋,因为30年后的事情谁能保证?此类例子,在陕西也比比皆是。据报道,1996年省旅游管理局为了帮助陕北贫困地区找到致富门路,曾准备组织一批农村姑娘到北京当家庭保姆,但结果令人失望。家长说,让俺娃到那么远的地方当保姆,多丢人!最终居然没有一个人报名。

参见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韩振军:《走出关中——陕西代表团采访感录》,《陕西日报》1997年3月13日。

文化观念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经济行为及其效果。一般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处在由旧质向新质的转型期内,传统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和信念,即传统文化总体上有碍于经济发展。然而有些论者却认为,对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追求,并不一定要求人们必须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换言之,经济增长过程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用现代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去取代传统的东西。他们以日本为例,说明生成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等级制就能很好地与现代化结合,成为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亚洲四小龙”也被他们看作是儒学能够促进现代化建设的证明。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是以经济发展为尺度去更新观念,而是如何使传统观念在新的条件下得以延续和“活化”,同时又力争不歪曲它们。

公允地讲,上述观点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如美国、英国和法国),传统的价值观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因为“现代”是由“传统”发展而来,它无论怎样“自觉”,都不可能与“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况且,人类实践活动本身所固有的普遍性品格,决定着“传统”中必然含有与“现代”相一致的文化因子。因此,“现代”只能扬弃“传统”,而不能抛弃传统。问题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价值上,不能过分夸大,以致于否定观念更新的必要性。以日本为例,在近、现代史上,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欧化”和二战以后的“美化”过程中,虽有“和魂洋才”之说,但也着实大量吸收了西方先进的观念文化。在当今日本社会,“人格尊严、民主、自由、平等

已成为公认的观念。”事实表明,不变革传统观念而进入现代化,只是一种理性的虚构。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归结为儒教,这近似于一个现代“神话”。韩国驻华大使黄秉泰博士在他的《儒学和现代化——中日韩儒学比较研究》一书中,向人们提出的忠告是:“儒学这个潘多拉的魔盒在现代化尚在进行时必须牢牢封住。”因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母腹中孕育成型的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与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相抵触的,不具备为现代化服务的功能。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必须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重新确立起一整套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的规范和价值准则。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为了保证经济能够顺利、健康地发展,我们必须冲破传统的束缚,使传统文化在我们的行动中丧失它的规范效应。传统只有失范,人才能得以解放,人力资源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充分利用,新的文化价值观才有建构起来并最终规范人们行为的希望。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是与文化自身的存在方式密切相关的。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文化中有一部分作为客体存在着,如物质产品、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等;另有一部分存在于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志之中,亦即存在于主体之中。从历史角度分析,存在于人自身之外的那一部分已经对象化了的文化,并不必然存活于每时每刻和每个人的行为中,并通过人的活动对经济发展过程施加影响。而不加入到人的活动中的文化,已丧失了它的功能,在分析问题时可以不予考虑。如此说来,只有存

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1 版,第 339 页。

《潘多拉魔盒:封住,还是打开》,《光明日报》1995 年 5 月 11 日。

在于人的思想观念之中的那部分文化,才必然存活在人的活动中,并对人的活动结果发生着真切的影响。存在于人之中的那部分文化是什么呢?它不是别的,正是人格。人格是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

关于人格的定义,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回答。从人格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人格是一种格式,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有机整体。这些构成要素,广义讲,指人的一切属性(无论是先天遗传,抑或是后天习得);狭义讲,主要指观念、情感和行为三类要素。观念主要包括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质、知识经验等。情感主要包括道德感、美感和理智感等。行为则包括行为的能力(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和行为品质(退缩与进取、勇敢与怯懦、独立与顺从等)。由于这三类要素自身又包含着要素,故而它们是构成人格这一系统的子系统,各自也都有着一定的结构模式。因此,人格可以被看作是由观念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构成的统一体。其中,观念和情感模式是内化了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则是外化了的观念和情感模式。在人格概念中,观念模式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格差异最终根源于观念上的差异。显然,这样的人格界说十分宽泛,似乎人的一切都与人格有关,人格无所不包。其实,这种宽泛性正是人格范畴的本质特征之一。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人格’并不适用于用正规概念来解释,但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特殊方式。”

[美]威廉·A.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0 页。